



必須肅清 一切反革命分子

姚善堂編著

遼寧人民出版社

PDG

目 錄

為什麼要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	1
暗藏反革命分子的主要特點.....	12
肅清反革命分子的鬥爭和人民的切身關係.....	18
大家動手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	24
提高覺悟,克服不問政治傾向	33
提高警惕,糾正右傾麻痹思想	38
嚴防反革命分子的報復破壞.....	42
劃清階級界限,分清敵我	45

爲什麼要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

胡風反革命集團的被揭露，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我們在向社會主義前進的道路上取得的一個很大的勝利，在這個勝利的基礎上，我們不光是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還要徹底肅清一切公開的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爲什麼要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呢？這是因為：隨着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事業的進展，階級鬥爭越來越尖銳和複雜了，階級敵人對我們革命事業的破壞越來越厲害，爲了保證我們革命事業的勝利，保證廣大人民生命和財產的安全，我們就一定要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

大家知道，從一九五三年起，我們國家就開始了有計劃的經濟建設時期。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提出的過渡時期的總路綫，就是要在我們國家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完成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把落後的農業國變成先進的工業國，也就是要把我們國家建設成爲一個沒有剝削、沒有階級、國強民富的偉大社會主義國家。一九五五年七月在北京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審議並通過了我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這個計劃，就是根據黨在過渡

時期的總任務擬定的，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我國人民為實現國家過渡時期總任務而奮鬥的一個有決定意義的綱領。

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是：集中主要力量進行以蘇聯幫助我國建設的一五六個單位為中心的、由限額以上的六九四個建設單位組成的工業建設，建立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發展部分集體所有制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並發展手工業合作社，建立對於農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初步基礎；基本上把資本主義工商業分別地納入各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建立對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基礎。國家在這五年裏的投資是七百六十六億四千萬元，折合黃金是七萬萬兩。到第一個五年計劃全部實現的時候，我們國家就有了自己製造的汽車、飛機、火車頭、輪船和農業機器等，我國的工業和全部國民經濟將得到巨大的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成分的比重會有很大的增加，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的比重要大大的縮小，人民民主政權將會更加鞏固，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要有所提高。所有這些，都是全國人民所高興、擁護和積極支持的。但是，我們的建設事業並不是和和平平安平地進行的，在我們面前還存在着帝國主義、蔣介石殘餘匪幫、已經被消滅的階級和就要被消滅的階級中的反革命分子，他們絕不願意我們國家富強，絕不願意我們人民幸福。人民的勝利就是人民敵人的失敗；我們越勝利，

敵人就越是要狗急跳牆的作垂死掙扎。我們的敵人特別仇恨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事業，他們為了阻撓我們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挽救他們將要死亡的命運，就互相勾結起來，採用各種各樣的方式方法，向我們進行瘋狂的破壞。他們總想捲土重來，繼續騎在人民的頭上，繼續壓迫我們，剝削我們。

工業建設是我們的命根子，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中心。在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全部基本建設投資中，用在工業建設方面的佔百分之五十八以上；在全部七千六百多個建設單位中，工業方面佔了將近三千個。工業方面的建設單位，規模都較大。其中有大鋼鐵廠、汽車廠、拖拉機廠、飛機廠、重型機器廠、發電廠、煤礦、煉油廠、有色金屬工廠和化學工廠等。到一九五七年，我國工業總產值將比一九五二年增長將近一倍。我國人民都清楚的知道，工業落後是我國過去多少年來國弱民窮、受盡各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的根源；社會主義工業化是使我國富強和人民幸福的唯一正確的道路。我們的敵人也清楚的知道這一點。因此，敵人的破壞首先就集中在我們的工業特別是重工業建設上。他們想使我們新建起來的工廠、礦山變成灰燼，想使我們新安裝上的機器變成廢鐵，想使我們的現有企業大量耗費國家財產，生產廢品和不能生產。總之，他們想用各種破壞辦法來延緩我們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速度，想使我們永遠也建設不成社會主義。比方，瀋陽

冶煉廠鉛鼓風爐工段在一九五四年以前比較長時期存在“渣含鉛”比率高的問題(就是熔煉鉛時出的鉛渣裏含鉛的比率高),暗藏在這個廠子裏的反革命分子羅振乾,以“降低渣含鉛,解決車間關鍵問題”為名,來破壞鉛鼓風爐。當時,他利用領導上官僚主義、技術水平低和管理制度不嚴的弱點,提出“要降低渣含鉛必須提高焦率”的錯誤辦法,當時工人對此發生懷疑,曾提出不同意見,但都被他用種種“理由”騙過去。實行這個錯誤辦法以後,焦率一次比一次增高,最後提高到百分之十四點零八(一般是百分之十二到十三),因為焦率過高,鉛爐產生碲冰銅(這是一種化合物,冷卻很快,鉛爐出現了它就很難操作),致使鉛爐虹吸口(就是出鉛口)凝固,發生嚴重故障。發生故障以後,工人屢次提出故障和焦率過高有關,而反革命分子羅振乾還狡猾抵賴,並命令工人大量向虹吸口燒氧氣,結果把爐牆燒穿了一個大窟窿,發生了嚴重的跑鉛事故。由於反革命分子的破壞,鉛鼓風爐坩鍋結塊停止生產,一次給國家造成的損失,就是八萬二千三百多元,使工廠少為國家生產一百噸鉛,損害了工人的健康,損害了重要的設備。再像鑽進瀋陽第三建築公司當職員的反革命分子田玉崑,在一九五四年六月的一天夜裏放火,把工地材料倉庫的全部建築器材和三幢新建的宿舍給燒燬,還把前去救火的工地的黨支部書記張殿龍同志打昏。據不完全的統計,在一九五五年上半年裏遼寧省九

個市的經濟部門，共發生反革命破壞事故達一百五十三起。光是一九五四年一年遼寧省各工礦企業發生的八百多起破壞事故和可疑事故中，給國家直接造成的損失就有八百多萬元，間接的損失沒法計算。

實現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過渡時期總任務中的一個重要內容，也是第一個五年計劃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到第一個五年計劃最後一年的末尾和第二個五年計劃第一年的開頭，就是在一九五八年的春季，全國將有二億五千萬左右的人口——五千五百萬左右的農戶加入農業生產合作社，到那時候將有很多地區基本上完成合作化。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千百萬農民正歡欣鼓舞地建社入社，農業合作化的發展，必將增強社會主義的陣地，削弱以至最後完全消滅富農經濟的剝削，實現社會主義，使廣大農民過上更美滿幸福的日子，這對我們廣大農民羣衆來說，是可喜可慶的。可是，這對於反革命分子來說，則是可怕和可恨的，因為我們合作化的一天天發展，就是富農剝削制度的一天天的消滅，也就是敵人在農村進行反革命復辟的依靠越來越小了以至完全沒有了。不甘心死亡的農村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各種各樣的辦法來破壞農業合作化運動，像農民正考慮準備建社時，反革命分子就製造謠言，打擊羣衆中建社的積極分子，破壞合作化運動在農村中的政治影響；在一些合作社建成的時候，他們就利用剛辦社的一些缺點和

困難，進行挑撥離間，破壞合作社內部的團結，破壞合作社和互助組的團結，破壞社內農民和社外單幹農民的團結，破壞農具，毒害牲畜，破壞禾苗，燒燬莊稼，貪污公款，弄錯賬目，減少社員收益；在農業合作化大發展的時候，他們就組織假社假組和我們對立，有些反革命分子還混進合作社內部篡奪領導權和重要職務，把合作社當做他們進行反革命活動的據點。像遼陽縣大興村反革命分子劉長生破壞黎光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案件就是一個例子。劉長生是一個反動富農，在土地改革被鬥爭以後，他一邊放高利貸和大量僱工剝削，一邊暗中宣傳“單幹的好處”，有意地對抗我們的農業合作化運動。一九五四年夏天，大興村農民積極起來建社的時候，他偽裝成建社的“積極分子”，鑽進黎光農業生產合作社。他鑽進合作社以後，就想盡各種辦法來破壞合作社的發展和鞏固：在一九五五年春耕時，他故意把發了霉的高粱和大豆的種子拿到合作社裏想下到地裏，當被別人揭發了的時候，他又嫁禍於人，把這個罪責推到社主任的身上，還藉機挑撥離間，散佈失敗情緒，拉攏和挑唆一部分不知真相的社員，捏造十七條過錯攻擊社主任，造成社內不團結，社員生產情緒低落。合作社的耕畜本來就不夠，而在六月割趟最忙和最需要牲畜的季節，這個反革命分子竟在十八天當中，用紅礬連續毒死了四頭牲口，想把合作社完全搞垮。康平縣八區反革命分子劉萬明，放火燒燬合作社的三間房子和牲

口棚，燒死燒傷牲畜十三條，燒了三千斤穀草和一些農具。反革命分子周秀堂，是個反動地主，當過偽屯長，一貫欺壓和剝削農民，解放後仍禍心不死，造謠惑眾，破壞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和拉攏社員退社，在一九五五年夏天，還兩次掘堤放水，淹沒合作社青苗二百三十多畝，嚴重地破壞了農業生產。反革命分子破壞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事件，發生過很多，給我們造成的損失沒有法統計。

在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中，最寶貴的財產就是人，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就是依靠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忠實於祖國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一切善良的人來進行的。為了祖國人民幸福地生存，中國共產黨不僅領導中國人民建設美好的社會主義，還無微不至地關懷人民，我們的國家採取各種措施保障人民的生命和財產的安全。我們的工人和農民為了建設社會主義和給人類生產吃的用的，在用自己的辛勤勞動創造財富和文明，母親們為了人類的後代子孫的成長，付出她們的心血和精力在撫養着可愛的孩子。可是，反革命分子不但仇恨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還仇恨一切人，想殺害一切人，他們暗害的對象不但是共產黨人、革命幹部和人民解放軍戰士，而且暗害用勞動哺育人類的普通工人、農民，甚至暗害善良的母親和無知的孩子以至新生的嬰兒。潛藏在河北省石家莊專區第一人民醫院的反革命集團暗害人命就是一個例子，這個反革命集團的王丕昌、劉正、李宗泉

等罪犯，披着“醫生”的外衣，幹了很多害人的勾當。一九五二年秋天，定縣青年農民宋俊拴得個小腸串氣病，本來不治也不妨礙幹活，因莊稼收成好手頭寬，特地坐火車進城請醫生給治治，反革命分子王丕昌一見這個生氣勃勃的青年農民，又聽說他手頭寬來治病，就非常仇恨，故意把病說成“裂孔疝，不治危險，要開刀”！他找來一個從來沒有做過這種病症手術的牙科大夫袁文海（王丕昌的親近分子）來試作，在手術台上他們切開了宋俊拴的肚皮，宋疼得四肢打哆嗦，渾身大汗，直喊疼，而王丕昌說：“這樣壯的小伙子，割點肉算什麼？”然後就草草把肚皮縫合。宋俊拴被抬到病房後，不斷地慘叫，護士幾次催王丕昌來挽救，他却置之不理，兩天的工夫這個健壯的青年就被他們害死了。一九五二年十二月，王丕昌把中共獲鹿縣委副書記齊志偉同志的急性胃炎故意當闌尾炎動手術，之後又故意送不該吃的硬性食物給他吃，並採取陰險的排氣方法，結果害死了他。一九五三年十二月，轉業軍人張貴全的愛人宿金深臨產，因骨盤小到醫院治療，王丕昌給產婦破腹取出胎兒後，在給產婦縫合刀口時，把該縫三層的子宮口故意縫兩層，還不是每針結紮的連續縫法，很不牢固，使子宮刀口仍流血不止，到第二天早晨產婦因內出血而死亡了！光是一九五四年四月中旬到六月中旬的兩個月中，反革命分子劉正就害了六條人命，其中有四個農民、一個工人和一個九歲的農民孩子。這個反革命集團

共製造了破壞事故四十三起，害死了二十二個人，使二十一個人成為殘廢和喪失了健康。這個集團的骨幹分子李宗泉還曾經用暗語書寫我們內部情況一百二十多條，並以代號繪製我們重要地方的地圖，準備進行更大規模的反革命破壞活動。他們還曾經把氧氣瓶放在病房，用硫磺放火縱燒，想引起爆炸，毀滅醫院。暗藏在湖北省宣恩縣衛生院的反革命分子萬體福和董文彬等，在蔣匪特務龔順榕的指揮下，在衛生院裏，從一九五四年春季以來，打着中西醫的招牌，暗害死了共產黨員、解放軍副排長、轉業軍人馬德清，宣恩國營農場工人、共產黨員姜章全、石灰工人李家駒，中堡鄉貧農產婦譚春蘭，還暗害了三個小孩和剛剛落地的嬰兒。中堡鄉八個農民來看病，除了一個拒絕收留外，其他七個農民全被害死了！

當然，反革命分子還不只是破壞我們的工業生產和基本建設，破壞農業合作化運動和殺人放火，他們還進行造謠惑眾和挑撥離間，破壞黨和政府的各項政策，他們還組織反革命集團，進行散發反動標語和傳單、建立反動武裝等活動，他們還搞反動會道門，進行破壞生產、騙錢騙財甚至發展反革命組織的活動，他們竊取我們政治的、軍事的、經濟的和其他各方面的各種機密情報。反革命分子的罪惡多得很，上面所說的不過是幾個例子而已，就是這些，也足以看出反革命分子是多麼兇惡！這些反革命分子和殺人兇手的卑鄙醜惡和殘忍毒辣，是任何善良的

人所不能容忍的，他們完全喪失了人性，喪失了人類的天良，他們是人類的渣滓，是人民的公敵！上面這些事實證明，在過渡時期中，階級鬥爭是更加尖銳和複雜了，我們向社會主義的前進，不能不引起敵對階級和國內外敵人的各種各樣的破壞，而這種破壞就不能不引起階級鬥爭的複雜化和尖銳化，這種尖銳複雜的階級鬥爭形勢，將隨着我們革命的發展而發展着。

但是，這種階級鬥爭尖銳和複雜的形勢並不是所有的人都看到了，還有相當一部分人認識的不够清楚，像有不少人說：“經過了鎮壓反革命運動，剩下幾個沒什麼了不得的！”的確，我們國家經過一九五一年鎮壓反革命運動和後幾年在其他方面的鬥爭，鎮壓和打擊了一大批公開的反革命分子，使人民民主專政更加鞏固，社會秩序更加安定，這對保衛我們國家和人民的安全起了重大的作用。不過，那次鎮壓的是公開暴露出來的反革命分子，就是公開的反革命分子也不是都受到了鎮壓，其中有不小個數目漏了網，至於暗藏在各個方面的反革命分子，當時因為沒有來得及發現，沒有受到鎮壓，現在還大量地存在，這絕不能說反革命分子剩下不幾個了。當然，比較起來說我們好人還是佔絕對的大多數，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只佔極少數。但是，反革命分子數目雖然少，其危害却很大。斯大林同志曾經說過：“要實行搗亂和暗害，並不需要大批的人。要建築德涅泊爾工程（這是蘇聯最大的

發電站——編者註)，就需要成萬的工人。但要炸毀這一工程，也許至多需要幾十個人。要在戰爭期間打勝仗，可能需要幾個兵團的紅軍戰士。但要在前線上破壞這一勝利，却只要在某個軍部、甚至只要在某個師部內有幾個能偷出作戰計劃來交給敵軍的間諜就夠了。要建築一座大的鐵路橋梁，就需要幾千人。但要炸燬這座橋梁，却只需要幾個人就夠了。像這樣的例子可以舉出幾十個和幾百個來。”從上面我們所列舉的一些事實來看，我們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一切愛國人民，成年到頭辛勤地勞動，為的是發展生產，更快地建設我們的國家，可是，反革命分子只要想出一個陰謀詭計，只要耍出一個花招來，就會使多少寶貴的生命死亡，使多少人創造的無數財富化成灰燼！難道我們能看輕反革命的危害來鬆懈自己的警惕嗎？難道我們能讓所說的少數反革命分子繼續存在來危害我們嗎？那是絕對不能夠的。

我們還應該特別來認識反革命分子的目的到底是什麼。大家知道，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經過多少年的艱苦奮鬥和流血犧牲，才打倒了國內外敵人，建立了新中國，享受到革命勝利成果的人們，為了過上蘇聯人民那樣的好生活，正在忘我地建設社會主義社會。而反革命分子所幹的各種罪惡活動的目的，就是專要破壞我們已經得到的勝利果實，破壞我們正在進行的社會主義建設，不讓我們過好日子，他們想推翻我們的革命政權，把“印把

子”奪過去。如果反革命分子的陰謀詭計真的得到成功，那就是使中國倒退到帝國主義、地主和資本家統治的時代，那就是反革命騎在我們頭上的年月，那就是千萬革命同志和愛國人民的人頭落地，那就是億萬人民遭殃，還過那牛馬不如的奴隸生活。由此可見，反革命分子是所有愛國和善良人民的最危險的敵人，對於這樣陰險毒辣的敵人我們就必須消滅，如果還讓他們存在繼續活動，那就等於讓老虎來吃掉自己。 ；

我們和敵人是誓不兩立的，有他們就沒有我們，有我們就沒有他們。為了更加鞏固人民民主專政，保衛革命勝利成果，保衛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事業的勝利進行，保衛祖國安全和人民的幸福生活，我們就必須堅決、徹底、乾淨和全部地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

暗藏反革命分子的主要特點

胡風反革命集團真實臉孔和罪惡活動的揭露，引起了廣大人民的憤怒和仇恨，同時也提高了廣大人民對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警惕。但是，我們也有一部分人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認識的不夠清楚，比方有些人一提起反革命分子，就覺得一定是“樣子長的可惡，橫眉豎眼的傢伙”，認為“只有動槍動砲、殺人放火才是反革命分子”，換句話說，好像沒有公開進行破壞活動的就不算是什麼反革命分子。其實，有這種想法的人是把階級鬥爭看得太

簡單了，還沒有了解到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更加狡猾和更加隱蔽這個特點。

暗藏反革命分子的主要特點是什麼呢？就是用兩面派的手法，把自己巧妙地偽裝成革命者和先進者，裝成人民的朋友，表面上擁護革命，擁護共產黨，還會裝得勤勞刻苦和幹出一些“成績”，來迷惑黨和人民，蒙蔽黨和人民的眼睛，騙取黨和人民的信任；而暗地裏却破壞共產黨，破壞人民革命和社會主義事業，為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匪幫効勞。這裏遠的不說，舉一下我們遼寧省瀋陽市一個暗藏反革命分子的例子吧。一九四九年二月，瀋陽造紙廠來了個名叫鄭柏森的新工人，自己報稱黑山縣人，出身貧苦家庭，從小就生產勞動，說是沒念過書，也不識字，看報紙還倒拿着。他被分配到包裝組工作，表現很積極，主動找活幹，還“帶動”別人完成生產任務。在生產競賽當中被評為二等勞動模範，不久就參加了中國共產黨，接着被提拔為黨總支幹事和分廠支部書記。一九五〇年又被調到中共鐵西區委會當幹事，待人更加“和氣熱情”，特別關心羣衆，下雨天把自己雨傘借給別人用，天冷了把棉衣送給別人穿，誰到他家不吃飯不讓走。他的生活却很艱苦樸素，從來不穿新衣裳，家裏擺的也挺簡單，像個貧苦家庭出身的模樣。一九五〇年區委成立工業部，把他提拔當副部長，以後又調他當統戰部副部長。那麼他到底是個什麼人呢？原來他真名叫鄭廣興，黑龍江省呼蘭縣

人，家庭是大地主，他的父親鄭希和是惡霸地主，民憤很大，在土地改革時被鎮壓了；他原來是偽滿師道學校和警察學校的學生，以後在偽哈爾濱警察局特務科當執行警尉，負責調查“民心動向”，逮捕“反滿抗日”的愛國志士。“九三”勝利後隱瞞歷史，混到我們地方政府工作，不久被我們發覺扣押，釋放後他又跑到當時蔣賊佔領的長春，加入反動地主組織的“同鄉會”，後又逃到瀋陽當上蔣賊警衛大隊上等兵。瀋陽解放後他逃到天津，天津解放後沒路可逃，就隱瞞了全部反動歷史，改名換姓，編了一套假歷史和社會關係，潛回瀋陽混到我們工廠和黨內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他不但幹了很多挑撥離間，破壞工作和生產的勾當，他還在家裏長期包庇和掩藏了蔣賊特務馮希賢，並在經濟上幫助這個特務分子。反革命分子為什麼要偽裝起來呢？這是因為他們看到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在人民羣衆中有無限的威信，人民民主專政十分鞏固，誰要是公開地反對共產黨和人民政權，誰就會受到廣大人民的打擊，因此，他們就採取隱蔽的鬥爭方式，把他們那副反人民的可惡的真實臉孔遮蓋起來，暗中來破壞我們。

從已經發現的和國家公安機關掌握的材料來看，這種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不論在財政經濟界、政治法律界、文化教育界和各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中都有。他們為什麼能夠鑽到我們內部來還長久地暗藏下來呢？一是因為我

們的國家機關、人民團體、工礦企業、部隊、學校、合作社在招收和使用人員的時候，缺乏嚴格的審查；二是因為我們以前是處在革命的轟轟烈烈時期，我們是勝利者，各種各樣的人都向我們靠攏，其中不免混進一些反革命分子，我們還沒有來得及作徹底的清理；三是因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耍兩面派的欺騙手法，我們要想識破他們和肅清他們，就必須依靠領導機關的正確指導和廣大羣衆的高度覺悟相結合才能辦到，而我們過去在這方面的工作是有缺點的。簡單來說就是：他們耍各種各樣的手腕，用各種欺騙的辦法，混到我們內部來了。這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鑽進來以後，時刻在找我們的弱點，鑽我們的空子，破壞我們的生產和建設，偷盜我們黨和國家的機密，向帝國主義和蔣匪幫供給各種情報、造謠、放火和暗殺等等。這裏，舉幾個暗藏反革命分子用兩面派手法破壞我們的例子：

反革命分子徐書傑，是國民黨員，當過十年反動軍官。他隱瞞了反動歷史，在一九五二年混到大連工礦車輛廠當描圖員。他對領導上交給的任務，都“準時完成”，白天幹不完的工作，有時裝模作樣地忙到晚上，一點一點來騙取領導上的信任。一九五一年鎮壓反革命時，別人發覺他隱藏手槍，他怕露了馬腳不能繼續幹反革命活動，就裝着痛哭流涕找領導談話，還在大會上“坦白”了一點假歷史，交出隱藏的手槍和子彈，接着他又主動幫助別人工